

全章目录学辨*

全祖望(1705~1755)和章学诚(1738~1801),是清朝中叶的两位浙东史学巨匠。全章两人,一位以明史纂辑、宋元学术见长,一位以文史校讎理论闻名;史学贡献可以方驾。但在目录学方面,章学诚的名声远过于全祖望。全氏留给后人的目录学著作并不多,仅有专题目录《读易别录》3卷和一些零散的论文。虽如此,对于全氏,学者们的观点仍有歧异。例如关于《读易别录》,清人李慈铭说:“剖析精严,尤易义之囊钥”(《越缦堂读书记》)。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却说:“非经义,属图纬占卜之易书目录、记书名、卷数、注记出处。至于卷下,不题‘易’,全系著龟之书”(《中国版本目录学书籍解题》)。见仁见智,莫衷一是。近年来,有的同志还将全章二人作了比较,认为他们的目录学思想“极为接近”;《读易别录》所采取的“寓学术流别于目录之中的做法”“与章学诚的目录学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全氏亦属“主义例派”^{〔1〕},此说是否正确?全章两人在乾嘉目录学中各自的地位究竟怎样?两人的义例有无差异?对此,笔者不揣谫陋,试图作一比较研究,提出个人见解,就正于同好。

一、《读易别录》及其分析

《读易别录》分上、中、下三卷。上卷篇幅最大,列有图纬、阴阳灾异等14个类目,收书304种。这些书绝大部分出自朱彝尊的《经义考·易部》。《经义考》的广收博采,就其规模而言,确实“较陈振孙之解题更加繁富,比晁公武之书志尤觉精详”(卢见曾:《上经义考奏》);据经学而论,却

是“所以乱经者莫甚于此”(《读易别录·上》,以下全氏引文凡不注明者均出自本别录。)故全氏别录正是为纠缪补遗而作,可以作为《经义考·易部》的补编。

《读易别录·上》是考订性质的目录。为考订《经义考·易部》,全祖望引用了颇为丰富的材料。除利用汉隋唐宋四志的著龟家或五行家的著录外,他还稽考了許多史籍。其中有正史《汉书》、《南史》、《北史》等;政书类《通考》、《通志》、《玉海》等;以及方志和文集著作《朱子集》、《吴莱集》、《苏颂集》。因此,他得以对《经义考·易部》作比较全面的修订,指出“经义考失载者”(《三坟易典》等近30种书)、“不审而两列者”(如《易决》)、“书名误倒其文者”(如《周易卦颂》应为《易颂卦》),以及夺文、书名异文、卷数相异等讹谬。

在修订《经义考·易部》的同时,全氏亦对史志的有关类目和著录作了一些调整。这主要有两方面内容:其一为经部易类文献著录的调整。他认为《汉志》7种书(《杂灾异》、《神枢》等)、《隋志》5种书(《周易新图》等)和《宋志》的《陈搏易龙图》是“误入经部”。其二是将载于《经义考》的《汉志》著龟家、隋宋二志五行家的有关书籍,按自设类目重新进行了分类。《隋志》五行家之书,分入“通说阴阳灾异及占验体例”、“汉诸人卜筮林占”、“汉诸人以三式占验”、“律历家、天文家、兵家、禄命家、射覆家八目。《宋志》五行家之书,则分入上述类目除天文、禄命外的六目,以及堪舆家、医家、相家、丹灶家四目。这些调整有的属于史志五行家的同位类之间的出入,有的是在新分类

*拙作曾蒙毕干洁同志热情披阅,特此致谢。

体系之中的再分类。《宋志》五行家之芜杂,从另一方面证实了“宋志为诸史志中最丛脞者”这一《四库提要》的评价。

全祖望是本着“旧史之例”来条辨易学源流的。他说:“旧史之志艺文,盖自传义章句而外,或归之著龟家、或五行家、或天文家、或兵家、或道家、或释家、或神仙家,以见其名虽系于易,而实则非也”。全氏认为,朱彝尊把“无当于经”的“图纬之末流”一并收入易部,这是“不谙旧史之例”;易部不能成为它们的上位类。全祖望的经学思想决定了他的这个分类观点。清初的易学有其独特之处。时称“粲然复章千五百年汉学之绝者”的易学家惠栋(1697~1758),“专宗虞仲翔,之义,约其旨为注,演其说为疏”(江藩:《汉学师承记》)。虞翻承《孟氏易》,是为今文《易》,荀爽传《费氏易》,是为中古文《易》。惠氏治《易》具有混合今古文的倾向^[2]。全祖望的混合今古文则在谶纬方面。早在汉代,经今古文学家曾围绕谶纬问题进行有神论和无神论的辩论。经今古文学派以此作为分野。全祖望的经学兼有这两派的特征。为批评朱彝尊的《说纬》,全氏作过一篇《原纬》,一面痛斥“为纬者意以炫饰,惑世诬民”,一面又说“纬书之说为吾党所羞称,然除灾祥怪诞之外,不无可采,如律历之积分,典礼之遗文,旁罗博综,其言有物,但使择焉而精,未尝不极有关于经术也”(《鮑琦亭集》外编卷四十八);仿佛在寻找什么微言大义。由此可证,“全氏不与惠栋立异”的论点^[3],良有以也。混合今古文的现象固然是由易学自身的特点所决定,如《易》未遭秦火,汉《易》皆存古文、皆牵涉阴阳灾异,但更重要的是这种“混合”具有反理学的特色。清汉学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汉学了。启蒙思潮未能使全氏改变尊经的立场。我认为,无论是《读易别录·上》的易学分类,还是全氏为孟子章句者争配祀之席而借用隋志唐志加以辩解这一事实(同上外编卷三十九亚圣庙配享议中),其本意都是溯史志的学术源流来“卫经”。即便在当时目录学领域受到了启蒙思潮的影响,经的正统地位依然是阻碍目录学理论进展的障碍。在经的问题上,全章两人的态度迥然不同。

章学诚的理论表面上带有古文经学的特征^[4],而其内核则是“尊史抑经”。《易经·系辞传上》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道器论,在章氏手中成为“既从其道还治其身”的思想武器。从这种唯物主义认识论出发,他得出几个惊世骇俗的结论:(1)周公“集古圣之成”,制作典章,是“得位行道集大成者”。“道不离器”,“六经皆器”,孔子“有德无位”,只是“器”的保存整理者。(2)作为“器”,《易》是“所以开物成务”者,“掌于秦官太卜”,“列于掌故”(《文史通义》内篇二原道中),没有什么神秘性。按照其“经部宜通”说,有些易类文献可入《史籍考》。(3)将道器论运用于经部类目。经部易家应体现“即器而明道,会偏而得全”的原则。类目应容纳理论和方法两方面的内容,“以道器合一求之:则阴阳、著龟、杂占三条,当附《易经》为部次”(《校讎通义》补校汉艺文志第十),“经部易家与子部之五行阴阳家相出入”(同上互著第三),借批评刘向的六艺略为其互著理论张本。因此为防止易清之书的两歧牵掣,易家不得不互尊降贵,与子部作互著。目录学理论分歧必然导致分类实践的差异。例如,全祖望在《读易别录》中认为汉志的《古五子》18篇和《孟氏京房》11篇,是“误入经部”。章学诚则曰:“易部《古五子》注云:‘自甲子至壬子,说易阴阳’。其书当互见于数学略之阴阳类灾异。《孟氏京房》当互见于数学略之杂占或五行类”(同上汉志六艺第十三)。又如章氏说:“易部之《乾坤凿度》”,“与古昔史记相为出入,虽云已入朱氏经考,不能不于史考溯其渊源,乃使人晓然于殊途同归之义”(《章氏遗书》卷十三论修史籍考要略)。他肯定其史料价值,亦不反对经义考的著录。全氏则把该书列入图纬末流,说这类书“必不可以言经”,朱氏的著录是“乱经”。两人差异可见一斑。全氏未能摆脱尊经的羁轡,只得修补史志,未能取得目录学理论的实质进展;而章氏却苍头突起,终于使目录学理论发生了变革。一尊一抑,相去甚远,怎能说两人“极为接近,异曲同工”呢?

《读易别录·中》著录了山琮《老子幽易》等神仙道教之书10种。本卷小序涉及到纬学、王弼

玄学、邵雍道学三派的学术分类问题。其内容与《三家易学同源论》一文虽稍有出入，仍可互相印证。全氏说：“王韩之易行，而儒者转思京焦；及康节之易行，而儒者转思王韩；所谓耳食者也。岂知三家之门户同出于一宗，不过改易其旗帜而出之耳，果有异乎哉？吾观康节之生平，盖纯乎黄老者也；而著书则图纬居多，是殆善集二家之长者耶”（《魁埼亭集》外编卷三十八）。这里他所论证的主旨是：三家易既与老庄同源，则不仅可分立门户，也可“合”于道家。然而关于邵雍，全氏又说：“康节之学，别为一家。或谓《皇极经世》只是京焦末流，然康节之可以列圣门者，正不在此；亦犹温公之造九分者，不在潜虚也”（《宋元学案》卷九百源学案祖望按语）。于是邵雍又“列圣门”，这便是另一种“合”。就此而论，全氏似乎将邵雍看作是“儒化的道家”了。陈寅恪曾说过：“凡新儒家之学说，似无不有道教或与道教有关之佛教为之先导”^{〔5〕}。其实，对于宋学这种多学派合流、以周易对抗佛老的新儒学理论体系，全氏尤其强调以“合”的归类方法处理。在推许汤显祖改修的《宋史》时，他认为，“其书自本纪志表皆有更定，而列传体例之最善者，如合道学于儒林（自注：黎洲先生论明史不当分立道学传本此），……属百世不易之论”（《魁埼亭集》外编卷四十三答临川先生问汤氏宋史帖子）。

与全氏正相反，章学诚是赞成元丞相脱脱的宋史将儒林道学分传的。他的理由是，“史家法度，自学《春秋》据事直书，枝指不可断，而兀足不可伸，期于适如其事而已矣。儒术至宋而盛，儒学亦至宋而歧。道学诸传人物，实与儒林诸公迥然分别，自不得不如当日途辙分歧之实迹以载之”（《章氏遗书》外编卷三丙辰劄记）。章氏以史家法度处理学术分类问题，要求按照物质运动形式的固有次序分类或排列，因此强调儒林道学二者的分化。他又指出“宋后忽有道学之名、之事、之宗风派别”，道学这一类名得到肯定。章氏曾认为“司马迁之叙载籍”，是“能溯源、疏而理”的学术分类法则，在这个重要的分类问题上章氏就具体地运用了这项法则。

《读易别录·下》辑录了《经义考·易部》未收的卜筮文献。其中增录载于史志的《夏龟》等龟卜书 47 种，补录载于类书和文集的著书 27 种。本卷小序阐述了卜筮应一并入易的理由。全氏的分类依据主要是：（1）《尚书·洪范》云“七，稽疑，建立卜筮，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肆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2）《周礼》云“掌龟之官凡五，掌蓍之官祇一筮人”。（3）《礼记·祭义》云“易抱龟南面”。郑康成注：易，官名，即太卜。在此全氏用“以经解经”的方式考订了龟卜与易学的关系，认为应采用《周礼》典章制度所规定的、由三百六十官所组成的自然分类体系进行易学分类。这种早期的、粗糙的自然分类有其局限性，它不是科学的、系统的内容分类。当发现汉唐以来的卜筮文献“皆弱于士遁之说”时，全氏就面临着—个难题：怎样发展和超越自然分类体系，从而更准确地揭示图书的内容特征？他无法解决这个矛盾，最终只好“不敢登之经部而别录之”了事。

章学诚亦主张采用《周礼》的自然分类体系，但仅限于私门无著述的“官师合一”的时期。有此区别，使章氏能更为缜密精确地处理龟蓍与易部的关系。（1）章氏的分类体现了“质去而文不能独存”的文质论原则。他说：“古之文质合于一，至战国而各具之”，“古初无著述，而战国始从竹帛代口耳”；“明于战国升降之体势，……七略九流诸子百家之言可以导源而浚流”；“论文于战国而下，责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于形貌也”（《文史通义》内篇一诗教上，下）。以战国为分界点区分“文”与“质”，战国之前，可用自然分类；战国以降，可用内容分类。（2）章氏把易经与龟蓍看作道与器，即理论与方法的关系；并以道器论调整刘向、焦贛的易部类目设置。他说：“焦贛以《汉志》阴阳、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凡五出为非，因总入于五行，不知五行本之《尚书》，而阴阳、蓍龟本之于《周易》也”（《核雠通义》卷二焦贛误校汉志第十二）。值得注意的是，此处他没有说“互见”，而是说“本之”；这是在试图改变类目的属种关系，将龟蓍归入易部的下位类。实际上，在进行内容分类之前，章氏已注意到龟蓍的外表特征的差异，有过作形式分类的想

法。他说:“凡术数之学,各有师承,龟卜蓍筮,长短不同,《志》并列之,已嫌其术析也”(同上)。章氏曾把班固的图书分类看作是“惟辨迹、密而舛”,说它“拘于法度、动多掣肘”(同上卷三汉志诸子第十四);而章氏提出的“本之”和“互见”的分类构想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图书分类的直线单向排列的弱点。

二、全章目录学 义例之分析

全祖望是否属于章学诚那样的“义例派”?解答这个问题,还要深入研究其有关论述。全氏在乾隆元年(1736)写的《移明史馆帖子一、帖子二》集中地阐明了他的目录学义例。他说:“横云山人(指王鸿绪)撰《明艺文志稿》,专收有明一代之书,其简净似为可喜。然古人于艺文一门,必综历代所有,不以重复繁冗为嫌者,盖古今四部之存亡所由见焉”(《鮑琦亭集》外编卷四十二移明史馆帖子一)。全氏既不赞成王鸿绪删黄虞稷所补的四朝艺文,专收一代著述;又不满于焦竑《国史经籍志》的有名无实的纪藏书。他所要求的是第三种史志收录形式——“尽收前代书目”。但是,这种以通史系统目录方式编纂断代史志的作法,偏重于对旧志的征文考献,忽略了断代史的体例要求,在当时已不合时宜了^[6]。看来,“综历代所有”的全祖望是引“记百代之有无”的郑樵为同调的。关于史志收录范围问题,全章两人的态度仍然有所不同。章学诚一方面说:“明史止录有明一代著述,不录前代留遗,非故为阙略也。盖无专门著录名家勒为成书以作凭藉也”(《论修史籍考要略》)。另一方面又说:“史家书志之原,本于《官礼》”。“史家书志,自当以一代人官为纲领矣;而官守所隶,巨细无遗,势难尽著,则择其要者”(《文史通义》内篇一礼教)。这里的“志”应该包括“艺文”。如此而言,就要着重于“一代”,而不是“前代”;不过亦可“录前代”,然则有赖于“著录名家”之手笔。郑樵可否算作名家?似不算。章氏说:“郑氏未明著录源流当追官礼,徒斤斤焉纠其某书当甲而误乙,某书宜丙而讹丁”(《章

氏遗书》外编卷十七和州志艺文书序例)。在此应该指出,章氏对郑樵的理论不是全盘接受的。在“承通史家风”的会通史学思想方面,他“申郑”;在目录学领域,他则“补郑”。

全氏力倡的“不以重复繁冗为嫌”仅是章学诚对史志著录的特定要求。据章氏说,所谓“重复”有互著的重叠和编次失当的重复两种。“邮次有当重复者,有不当重复者。《汉志》以后,既无互注之例,则著录之重复,大都不关义类,全是编次之错谬尔”(《校雠通义》辨嫌名第五)。致使编次重复的原因在于:“一则门类疑似,一书两入也;一则一书两名,误认二家也”(同上)。《汉志》以后的若干史志“末学支离,至附类失据,重复错讹,可谓极矣”(和州志艺文书序例)。显然,章氏认为编次重复是应该避免的。

在阐释《汉志》义例方面,全章二人也存在着差异。对于班固为《师旷》所作的著录(按《汉志》中名《师旷》者有二:一在“诸子略小说家”,六篇,注曰“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之”。另一在“兵书略阴阳家”,八篇,注曰“晋平公臣”),全祖望选赏说:“《师旷》六篇,显然为后人因托,不敢轻去,阙所疑也”(移明史馆帖子一);认为这是班固辨伪并著录的范例。章氏则云:“书有同名而异实者,必著其同异之故而辨别其疑似焉,……《师旷》八篇,与小说家之《师旷》六篇同名”,“著录之家,皆当别白而条著者也”(《校雠通义》汉志兵书第十六);隐含责备班固未注明同名异书之意。这表明,章氏不仅在阐发义例,还在“自为义例”。

义例之可取法者,在全氏看来,还有《新唐书·艺文志》。一则“其于三唐图籍必略及其大意,而官书更备,凡撰述覆审删正之人,皆详载焉”(《鮑琦亭外集》卷四十二移明史馆帖子二)。譬如新唐志乙部史录起居注类《则天皇后实录》,仅注类的《永徽五礼》和《开元礼》、职官类《六典》等条目的近似传录体的小注,“是皆有系于一代之事,而不徒以该洽为博”(同上)。二则“至于别集之下,虽以明经及第,幕府微僚,旁及通人德士,皆为详其邑里,纪其行事,使后世读是书者得有所

据以补列传之所不备”(同上),譬如丁部集录别集类《丘为集》、《滕珣集》、《包融诗》的小注。笔者认为新唐志的传录小注有其特殊用意。如果说“变叙之名、从传之实”的《七志》《七录》上绍《别录》《七略》之遗绪,以目录立传的手法补充史籍列传之不足,这可称为“间接补传”的话,那么《新唐书》纂修者欧阳修、宋祁在本书体例范围以内,本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曾公亮:进新唐书表)的编修宗旨,以本书艺文志补本书纪传,这便是特定的“直接补传”的方法。“载丘为之居丧,可以见当时牧守惠养老臣之礼;滕珣乞休,可以见当时职官给养还乡之礼”(移明史馆帖子二)。这种考订性质的传录小注虽“不能发明作者之意”,即能使“遗文籍此不坠”。艺文与纪传的配合就起到了省文洁笔、相得益彰的作用。但是此法与其说是严格意义上的目录学义例,毋宁说是正史编纂方法^[7]。较早试图应用新唐志此法的是焦循(1763~1820)。焦氏不以“纸不胜书”的黼祭为然,主张编纂郡县志艺文略“用《新唐书》之例,凡人之不必立传者,但书其爵里于书名之下。则列传中,省无限闲文”,列传“不必多立子目”(《雕菰楼集》卷十三上郡宁伊公书)。

章学诚也曾论及艺文与列传的配合,云“艺文一志,实为学术之宗,明道之要,而列传之与为表里发明,此则用史翼经之明验也”(《校讎通义》卷三汉志六艺第十三)。“表里发明”旨在推考“古学渊源、师儒传授、及承学流别”,不单纯是全氏所云“补列传之所不备”。值得说明的是,章氏的这段话不是指新唐志义例,而是指《汉志》六艺略与儒林列传的相辅相成的关系。依章氏看来,新唐志并不可借鉴之处。(1)“唐书艺文,不叙渊源”(《文史通义》内篇四释通),暗指其无小序无解题。(2)关于类目设置:“唐志以‘纪传’为‘正史’,而直以‘编年’为‘编年’,乃是别出‘编年’为非‘正史’矣”(《章氏遗书》补遗史考释例)。他称其为“名实倒置”,“于义未实”。(3)关于其著录:新唐志的“《西京杂记》既入故事,又互见于地理。是岂足以知古人互见之法耶?特忘其已登著录,重复而至于讹错者尔”(和州志艺文序例),他斥之为“末学

支离”。实际上,章氏对《新唐书》的总评价亦不甚高。倘若以纪传作为衡量正史的尺度,章氏认为新书纪传是“纪传之次焉者”,不逮“最古者”(如马班陈氏),胜于“最敝者”(如宋元之史)(《文史通义》外篇一史篇别录例议)。全祖望的新唐志义例便不见取于章氏。

嘉庆年间,韩江马氏兄弟编成《丛书楼书目》。全氏为之序,写道“今世有所谓书目之学者矣。记其撰人之时代,分帙之簿翻,以资口给,即其有得于此者,亦不过以裨黼祭之用。《丛书楼书目》之出也,必有以为之鸿宝者矣”(《和州志艺文集》卷三十二)。余嘉锡先生说这是全氏嘲讽当时的“书目之学”^[8]。笔者亦同意此说,不认为这是“全祖望在力贬目录学地位”^[9]。全氏目录学兼有义例和考订两方面,而以考订内容居多。他要求辨伪:“天下图籍至繁,岂无逸出于山林草泽之间,而必以内府所藏核之,防作伪也”(移明史馆帖子一)。又要据史志考订:“其卷数或校前志而少,则书之阙可知;或校前志而多,即未必伪,要其书之搀改失真可知”(同上)。全氏草精南宋残明史乘,以“述旧闻补逸事”为尚,故其目录学以搜剔遗逸、考订异同为主。《读易别录》考辨出的包括“伪中伪”《易乾凿度》在内的“图纬末流”,以及别录本身就是这种考订的成果。章学诚则不以考订为“学问”,而欲“上闡古人精微、下启后人津逮”,力图把握整个史学发展进程。他的目录学注重推阐义例,认为注重类目之间的关联才有互著别裁之建树。不错,同章氏相比,“全氏的考订风格多一些”,但所谓考订风格孰多孰少的问题,说到底还是目录学方法论的问题。至于全氏认为“有明一代艺文极繁,然《太祖实录》已为杨士奇芟改失实,至纂修书传会选诸臣姓名,因其中有殉让帝难者,尽削去之,则文籍之不足凭如此。冯涿州再相奋笔改《熹庙实录》,而刘若愚《酌中志》或去其黑头,爰立佳偶一卷,以为之讳,则篇第之不足凭如此。是皆本志所当严核者”(移明史馆帖子二)。此种目录考订则与王鸣盛“十七史目录之学”的那种臧否作者、知人论世的考订属同一性质,这在章氏的目录学中更是找不到的。

全章二人分歧的焦点在于朱彝尊的《经义考》。全祖望对经考颇多责难。其意见是：(1)“谬托于经而实不可以言经者，皆未加剔白也”。(2)“图学之去取未审也”。(3)“粗涉于经而原非解经者不必收也”(《鮑塘亭集》外编卷四十一答郑筠谷赞论朱氏经义考帖子)。一言以蔽之，乃“不审旧史之例”。而章学诚却很推崇《经义考》，认为以它为蓝本，“一仿朱氏成法，少加变通”，可成《史籍考》。在他看来，“朱氏经考乃史学之支流，刘班七略艺文之义例也”(《章氏遗书》卷二十八上朱中堂世叔)。不言而喻，智者乐山，仁者乐水，全章两人的义例原本是两回事。

综上所述，我认为全氏目录学理论中并没有章氏那样的启蒙思想内涵和艺文学案思想内容。而启蒙思想内涵正是形成差异的根本因素。章学诚的目录学思想与其哲学、文史思想有着互为表里的关系。章氏理论之所以显得深刻一些，就因为其目录学中蕴涵着早期启蒙思想精髓。他以道器论抑经，使经部类目得到调整，为互著别裁理论的形成与完善奠定了基础；以文质论抑经，为经学文献的内容分类找到了理论依据。从这种意义上说，在史志目录中实行抑经，就意味着新目录学理论的创立。受其理论指导，他创造了独特地著录方式和义例。在另一方面，我们能否由于全章两人同属浙东学派，就将他们一并划入“义例派”呢？不能。何炳松说过“黄宗羲承刘宗周之衣钵，‘蔚成清代宁波万斯同、全祖望和绍兴邵廷采、章学诚两大史学系，前者有学术史之创作，后者有新通史之主张’”(《浙东学派溯源》)。对于全章两位史家来说，史学与目录学息

息相通，史学路径不同，目录学路径亦不同。所以我们不妨说，浙东学派也存在着两个目录学系。全氏在雍乾时期并未形成后来那么鲜明的义例派或考订派特色，这反映出乾嘉目录学自身发展的阶段性。还要看到，章氏目录学是独树一帜的，其理论固然有承借前人同辈的因素，但绝非是和谁“极为接近”的产物。何况他所达到的目录学理论高度，当时无人望其项背。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有必要将全章两人区别开来。

参考文献

- (1) 李国新.论乾嘉目录学.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 1986,(4)
 - (2) 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
 - (3) 祁龙威.乾嘉史学初探.江海学刊,1962,(1)
 - (4) 周予同.经今古文学.商务印书馆,1926
 - (5) 陈寅恪.审查报告三.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37
 - (6) 王重民.明史艺文志与补史艺文志的兴起.图书馆学通讯,1981,(3)
 - (7) 董允辉.中国正史编纂法.正中书局,1936
 - (8)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中华书局,1963
 - (9) 来新夏.古典目录学浅说.中华书局,1981
-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来稿时间:1991.8。编发者:刘喜申。)

(上接 52 页) See: New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Librarianship. New Delhi: Allied Publishers Private Limited, 1984, 264-276

(2) Palmer, B.I. & Wells, A.J. The Process of Division, The Fundamentals of Library Classification.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61. 35-41

(3) Kaula, A. Dr Ranganathan and Library Education. New York: Asia Publishing House, 1965, Vol. 1, 553-557

(4) Cochrance, P.A. Personal Communication. 3 Jan. 1984

(5) Kaula, P.N. Ranganathan: A Study. Same (3) 649-676

(6) Wellishch, H.H. Classification, ALA World Encyclopedia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Chicago: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80, 146-150

(作者单位:空军政院图档系。来稿时间:1992.1。编发者:丘峰。)

G252

Design and Realization of User Interface for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on Search Softwares / Cao Huangang and Wang Bingrong / / Bulletin of the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1992,18(3).-62~65

In order to enable computers to bring their potentialities into full play in respect to the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on search of China, the design of a user interface for a friendly relation between users and computers has become important in the field of automation of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on search. Technical problems such as the composition of a good user interface, design principles, menu design and interactive processing, etc. are mainly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2 illus. 6 references.

Computer search —— User interfaces

Man-computer interaction —— Studies

G354.46

New Theft Monitoring Methods for Books and Periodicals and the Relevant Examination and Test Plans / Pan Boming / / Bulletin of the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 1992,18(3). -66~68

As soon as the book, stuck with magnetic stripe, is brought out of the library, the monitor signals. But the stripe is very easily to be discovered and then destroyed and, as a result, the monitor will be unable to work. Thus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a new method for book and periodical processing to use magnetic liquid, magnetic ink paste and magnetic particles instead of the former solid magnetic stripes. The author also brings forth two plans of the examination and test methods of magnetic stagnation and saturation screen.

Library techniques —— Preparations

Theft monitoring for books and periodicals —— Ways and means

G258.93

The Discrimination between Bibliographies by Quan and Zhang / Yin Di / / Bulletin of the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1992,18(3). -69~74

Quan Zuwang and Zhang Xuecheng were both bibliognosts of Qing Dynasty. In Quan's theory of bibliography, there is neither the connotation of enlightenment thought nor the ideological content of, what is called the Yi Wen Xue An in Zhang's bibliographical thinking, which, together with his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thinking has reciprocal outward show and inner thought. He had founded the theory of new bibliography and developed a school of his own. It's true that his theory carries on the theories of his predecessors and those of the same generation of him, but it is by no means the product of "being very close" to any of theirs.

Bibliography —— Studies

Quan Zuwang —— Theory of bibliography

Zhang Xuecheng —— Theory of Bibliography

G257

(周钰坪 译校)